

# 吐鲁番新获回鹘文书探究

李 刚<sup>1,2</sup>

(1. 新疆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

2. 吐鲁番学研究院, 新疆 吐鲁番 838000)

**摘要:** 2015年,吐峪沟西区的中部高台新发现了纸质和木牍等各类回鹘文书,经对这些文书释读甄别后发现:四件木牍回鹘文书有三件都清楚地记录主人姓名等信息;纸质文书一经确定为《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简称《七星经》),文书二为韵文文体文书;文书四提到讲经师沙弥土都(Šabi Tudun)等信息,等等。这为我们深入探究《七星经》在吐鲁番的传播和发展,丰富和拓展我们对蒙元时期吐鲁番的历史文化的理解,探索蒙元时期回鹘韵文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考古资料。

**关键词:** 吐鲁番 吐峪沟 回鹘文 《七星经》

**中图分类号:** K877.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6252(2022)02-0066-14

201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吐鲁番学研究院考古室对新疆吐鲁番吐峪沟西区中部高台窟寺院进行了四次考古发掘,共发掘清理洞窟五十座,除了获得了大量的文物,主要包括木器、陶制品、铜器、纺织品、骨器和之物遗存等<sup>①</sup>,还新发现洞窟残存的回鹘文和婆罗米文题记和一定数量的纸质非汉语文书(回鹘文、粟特文、藏文、婆罗米文等)以及各类回鹘文书等。

## 一、吐峪沟石窟寺研究简述

自19世纪中叶起,外国探险家就涉足吐峪沟石窟,如俄国雷格尔(A. Regel)、罗波洛夫斯基(V. I. Roborovsky)、科兹洛夫(P. K. Kozlov)、克莱门兹(D. A. Klemenc),奥登堡(Oldenburg),德国主要由格伦威德尔(Albert Grünwedel)和勒柯克(Le Coq)带领的前三次探险队,英国斯坦因(Aurel. Stein)的探险以及日本大谷光瑞

收稿日期: 2021-06-2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华文化视野下的吐鲁番回鹘文题记研究”(18BYY199)

作者简介: 李刚(1981-),男,甘肃武威人。博士后、副研究馆员,主要从事回鹘文文献的研究与整理。

① 李裕群、夏立栋、王龙、张海龙《新疆鄯善吐峪沟西区中部高台窟院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20年第3期,第429-460页。

(Otani Kozui) 探险队的橘瑞超 (Tachibana Zuicho) 和野村荣三郎 (Nomura Saburo) 等从吐峪沟盗掠了大量珍贵的文物和文书, 这些文物和文书均由上述学者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sup>①</sup>

新中国成立以后, 国内学者也对吐峪沟进行过考察和研究, 但多是集中于洞窟壁画、考古调查和文物保护方面, 而从语言文字、石窟的分期等综合方面进行的研究还十分有限。可以说, 对于吐峪沟石窟的纵深多角度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加大。

考古调查方面: 1928 年考古先驱黄文弼先生率领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对吐峪沟进行了实地考察。1952 年武伯纶、常书鸿为首的西北文物考察组再次考察吐峪沟石窟。1961 年, 北京大学阎文儒教授与通一法师受中国佛教协会委托, 对吐峪沟石窟进行测绘记录。<sup>②</sup> 20 世纪 90 年代, 北京大学考古系晁华山教授在新疆调查佛教石窟遗址, 他提出吐峪沟中部分洞窟应为摩尼教遗存。<sup>③</sup> 1995 年柳洪亮先生又撰文对吐鲁番的诸多石窟进行了研究探讨, 其中包括吐峪沟石窟。<sup>④</sup>

2011 年陈凌等对 2010 年吐峪沟的考古发掘成果进行了报道介绍同时对吐峪沟石窟寺遗址概况及考古收获进行了阐述。<sup>⑤</sup> 同年, 李裕群教授等从考古学的角度对吐峪沟的东区北部窟群、西区北部窟群和东区南部地面佛寺和考古收获或新发现等方面做了介绍。<sup>⑥</sup> 2012 年, 陈凌教授等对吐峪沟西区和东区分别以简报的形式对考古发掘的成果和收获情况进行了报道和分析。<sup>⑦</sup> 2015 年李肖教授从考古学的角度对吐峪沟石窟的考古收获或新发现、吐峪沟石窟的形制、石窟的开凿年代等相关问题做了详细的阐述。<sup>⑧</sup> 同年, 陈凌教授再次撰文对吐峪沟石窟近年来的考古成果和收获做了综述。<sup>⑨</sup> 还有丁晓

① 主要论著有: 香川默识《西域考古图谱》, 日本: 国华社, 1915 年; Stein, Marc Aurel, *Serind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 (Vol 1-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1; Le Coq, Albert von, *Bilderatlas zur Kunst und Kulturgeschichte Mittel-Asiens*, 1924; Grünwedel, Albert, *Alt buddhistische Kultstätten in Chinesisch-Turkistan*, Berlin, 1912; Le Coq, Albert von, *Bilderatlas zur Kunst und Kulturgeschichte Mittel-Asiens*, Berlin, 1925; Le Coq, Albert von, *Von Land und Leuten in Ostturkistan*, Leipzig, 1928; Oldenburg, Sergei Fedorovich, *Russkaia Turkestanskaia Ekspeditsiia, 1909-1910 goda*, St. Peterburg, 1914.

② 阎文儒《新疆天山以南的石窟》,《文物》1962 年第 7-8 期, 第 28-32 页。

③ 晁华山《寻觅淹没千年的东方摩尼寺》,《中国文化》1993 年第 8 期, 第 1-20 页。

④ 柳洪亮《高昌石窟概述》,《中国新疆壁画全集》第 6 卷《吐峪沟·柏孜克里克》,沈阳: 辽宁美术出版社, 1995 年, 第 1-22 页。

⑤ 陈凌、李裕群、李肖《二〇一〇年新疆吐峪沟石窟考古新收获》,《中国文物报》2011 年 1 月 21 日第 9 版; 陈凌、李裕群、李肖《新疆鄯善县吐峪沟石窟寺遗址》,《考古》2011 年第 7 期, 第 27-32 页。

⑥ 李裕群、李肖、陈凌《吐峪沟石窟的新发现影响吐鲁番历史的佛教遗址》,《中国文化遗产》2011 年第 2 期, 第 66-73 页。

⑦ 陈凌、李裕群、李肖《新疆鄯善县吐峪沟东区北侧石窟发掘简报》,《考古》2012 年第 1 期, 第 7-16 页; 陈凌、李裕群、李肖《新疆鄯善县吐峪沟西区北侧石窟发掘简报》,《考古》2012 年第 1 期, 第 17-20 页。

⑧ 李肖《近年吐鲁番佛教石窟寺考古的新收获》,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主编《西域——中亚语文学研究: 2012 年中央民族大学主办西域——中亚语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年, 第 143-156 页。

⑨ 陈凌《近年吐峪沟石窟考古收获与认识述略》,余太山、李锦绣主编《欧亚学刊》新 3 辑,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年, 第 36-51 页。

莲、王龙等对吐峪沟石窟寺西岸中区考古发掘情况进行报道。<sup>①</sup>

2019年夏立栋等撰文对吐峪沟西区中部回鹘佛寺发掘的情况进行了介绍。<sup>②</sup> 2020年李裕群等又撰文对吐峪沟西区中部高台窟院的考古新发现和收获进行了详细的报道。<sup>③</sup> 2021年吾买尔·卡得尔等对吐峪沟石窟瘞窟进行了重新调查取得了新的收获。<sup>④</sup>

壁画保护与研究方面：主要有宫治昭先生对吐峪沟的壁画风格和石窟形制进行了研究探索。<sup>⑤</sup> 山部能宜先生从壁画禅观的角度对石窟壁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sup>⑥</sup> 贾应逸是对吐峪沟石窟壁画研究较早且成果最显著的学者之一，她从壁画的角度多次撰文对吐峪沟的壁画内容、石窟形制和绘画艺术进行了深入的探讨。<sup>⑦</sup>此外，近些年还有侯世新<sup>⑧</sup>、徐玉琼<sup>⑨</sup>、赵阳<sup>⑩</sup>、徐东良<sup>⑪</sup>、侯明明<sup>⑫</sup>、赵丽娅<sup>⑬</sup>、刘韬<sup>⑭</sup>等学者撰文从壁画分析角度对吐峪沟石窟进行的研究。还有李媛<sup>⑮</sup>、李薨<sup>⑯</sup>等学者从文物保护修复和服饰壁画的角度进行的相关研究。

回鹘文题记研究方面：2019年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对吐峪沟北10号窟新发现的

- 
- ① 丁晓莲、王龙《吐峪沟石窟寺西岸中区考古新收获》，《吐鲁番学研究》2015年第1期，第155-156页。
- ② 夏立栋、李裕群、王龙、张海龙《新疆鄯善县吐峪沟西区中部回鹘佛寺发掘简报》，《考古》2019年第4期，第57-63页。
- ③ 李裕群、夏立栋、王龙、张海龙《新疆鄯善吐峪沟西区中部高台窟院发掘报告》，第429-460页。
- ④ 吾买尔·卡得尔、杨超杰《吐峪沟石窟瘞窟的新调查》，《中原文物》2021年第4期，第114-118页。
- ⑤ [日] 宫治昭著，贺小萍译《吐峪沟石窟壁画与禅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 ⑥ [日] 山部能宜《禅观与石窟》，《宗教研究》2012年第1期，第112-132页；[日] 山部能宜著，陈瑞连译，杨富学校《吐峪沟第42窟禅观壁画研究——兼及汉文禅观文献的起源》，《敦煌研究》2015年第4期，第35-42页；[日] 山部能宜著，杨富学、侯明明译《从〈观无量寿经〉看吐鲁番吐峪沟“摩尼教窟”之指归》，陕西历史博物馆编《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23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16年，第257-268页。
- ⑦ 贾应逸《新疆佛教壁画的历史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72-393页。
- ⑧ 侯世新《吐峪沟石窟寺第38窟龟兹风探析》，《敦煌学辑刊》2011年第2期，第122-131页。
- ⑨ 徐玉琼《高昌早期佛教造像形制及其特征——以吐峪沟石窟壁画为中心》，《长江大学学报》2013年第36期，第3-4页。
- ⑩ 赵阳《吐峪沟石窟第44窟兔王本生故事考》，《敦煌研究》2013年第6期，第18-22页。
- ⑪ 徐东良、陈玉珍、赵阳《吐峪沟石窟壁画线描集图解》，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石窟专业委员会、龙门石窟研究院编《石窟寺研究》第5辑，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229-254页。
- ⑫ 侯明明、杨富学《吐峪沟半白半黑人骨像“摩尼教说”驳议》，《吐鲁番学研究》2013年第2期，第86-92页；侯明明《吐峪沟“摩尼教窟”之宗教属性辨析》，西北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 ⑬ 赵丽娅《龟兹风佛教艺术的特点及其和吐峪沟石窟的关系》，《新疆艺术学院学报》2015年第13期，第8-12页。
- ⑭ 刘韬《高昌夜叉图像考——以吐峪沟西区中部回鹘佛寺主室门道南壁画迹为中心》，《美术学报》2021年第4期，第66-71页。
- ⑮ 李媛《吐鲁番吐峪沟石窟一件新出土文书的保护与修复》，《文物鉴定与鉴赏》2010年第11期，第108-110页。
- ⑯ 李薨、沈雁编《中国北方古代少数民族服饰研究·回鹘卷》，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

回鹘香客题记进行了研究,<sup>①</sup> 2020年吐送江·依明撰文对吐峪沟新发现的题记进行研究,<sup>②</sup> 2021年李刚等撰文对吐峪沟新发的题记做了细致全面的研究,<sup>③</sup> 同年付马等又撰文对吐峪沟26窟的回鹘文题记进行了深入研究。<sup>④</sup>

## 二、各类回鹘文书释读

本文研究的回鹘文文书共有七件,三类。其中两件(图1-2)为纸质类文书,四件为木牍类文书(图3-9),一件为榜题类文书(图10)。

凡例:[ ]表示原文残缺或漫漶不清;[abc]表示根据上下文对残缺或漫漶不清的补写内容;(abc)表示根据残存字母补写或省略的元音;(…)表示残存但无法识别;转写字母 z(=s), d(=t), ş(=z), t(=d), š(=ž)。

### 回鹘文书一

#### (一) 文书简介

该件文书出土于57窟前室地窖中<sup>⑤</sup>,呈不规则的长方形,纸质文书长22厘米,宽15厘米<sup>⑥</sup>,纸张为土黄色,回鹘文墨笔草体单面书写,文书上下无边框线,共有12行文字,保存一般,文书右上角有一枚红色印章。(见图1)

#### (二) 原文转写

- 1 aram ay yeti yaŋi [-qa]
- 2 ikindi ay törđyaŋi [-qa]
- 3 üçünč ay iki yaŋi [-qa]
- 4 törđünč ay yeti ođuz [-qa]
- 5 bešinč ay beš otuz [-qa]
- 6 altinč ay üçođuz [-qa]
- 7 yetinč ay yig [r] mikä
- 8 säkišinč ay yeti yigrmikä

① Abdurisht Yakup, Li Xiao, A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old Uighur pilgrim inscriptions recently discovered in the cave NK 10 in the Tuyuq grottoes of Turfan, *AOH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72/4, 2019, pp. 399-417.

② 吐送江·依明《吐峪沟石窟佛教遗址新发现回鹘文题记释读》,《敦煌研究》2020年第5期,第115-127页。

③ 李刚、张海龙《吐鲁番吐峪沟10号窟新发现之回鹘文题记考释》,《西域研究》2021年第1期,第152-164页; Li Gang, Zhang Hailong, Uyghur Wall Inscriptions Newly Discovered in the Cave 26 of the Tuyuq Grottoes of Turfan, *SIAL (Studies on the Inner Asian Languages)* 36, 2021, pp. 23-59.

④ Fu Ma and Xia Lidong, Comprehensive Study on Old Uighur and Chinese Wall Inscriptions in Room B of Newly Excavated Cave 26 in Tuyuq Grottoes, Turfan, *AOH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74/2, 2021, pp. 181-206.

⑤ 李裕群、夏立栋、王龙、张海龙《新疆鄯善吐峪沟西区中部高台窟院发掘报告》,第452页。

⑥ 李裕群、夏立栋、王龙、张海龙《新疆鄯善吐峪沟西区中部高台窟院发掘报告》,第452页。

- 9 toquşunč ay yigrmi-kä  
 10 onunč ay bir y [i] gr [mikä]  
 11 bir yigrminč ay beş yigrmikä  
 12 čaxşabuđ ay säkiz yaŋi [-qa]

## (三) 汉译

1. 一月初七…… 2. 二月初四…… 3. 三月初二…… 4. 四月二十七日…… 5. 五月二十五日…… 6. 六月二十三日…… 7. 七月二十日…… 8. 八月十七…… 9. 九月二十日……  
 10. 十月十一日…… 11. 十一月十五日…… 12. 斋月（十二月）初八……

## (四) 注释

12 (1) čaxşabuđ: 该词常常写作č(a) xšap (a) t 和čaqaşaput. 该词通过粟特语čxš ‘pδ 借自梵语sikṣāpada ①“斋戒”。

## 回鹘文书二

## (一) 文书简介

文书发现于 54 窟后室前壁下,② 呈不规则的长方形,纸质文书,长 18.6 厘米,宽 17 厘米③,纸张颜色为土黄色,回鹘文墨笔楷体单面书写,字迹清晰,文书上下无边框,共有文字 11 行,文书 4 至 6 行上部,8 至 9 行下部破损有洞,保存较好。(见图 2)

## (二) 原文转写

- 1 yaruq yalđıry [ ] WSWP čılayu [ ] VD-ZWN  
 2 baxşı birlä bolγan-lar-niŋ uduşmaq-ınga tusuşup  
 3 nom äşidip vyakrit bolup tuyunmaq-ıy tanuqlalim  
 4 kalp alqınyınča baxşı birlä burxan-qa utlı öđünüp  
 5 nom-uγ WL [ ] oγuyş-ındaqı-larqa asıy qılalim  
 6 küñdüz enčäsän tünlä enčäsän  
 7 küñdüz tünlä altı ödtä enčäsän  
 8 alčulayu oq alqu ödtä enčäsän  
 9 utlı täg tükäl-lig baxşı (ber) z-un biziŋä  
 10 biz-niŋ kertgüč-lüg yiltüzimizniŋ küçindä  
 11 nom oγuyş-niŋ tilđay- [in] tün turtım (?) -a küçindä

## (三) 汉译

1. 光明……真如…… 2. 与大师追随者相遇 3. 愿我们闻法授记达正觉 4. 与消除劫

① Wilkens, Jens, Handwörterbuch des Altuirischen, Göttingen, 2021, p. 216.

② 李裕群、夏立栋、王龙、张海龙《新疆鄯善吐峪沟西区中部高台窟院发掘报告》,第 452 页。

③ 李裕群、夏立栋、王龙、张海龙《新疆鄯善吐峪沟西区中部高台窟院发掘报告》,第 452 页。

难的大师一道向佛祖寻求佛果。5. 让我们使（佛）法……国获得益处。6. 昼夜平安。7. 早晚六时平安。8. 如此一切（将）平安无事。9. 让（得到）佛果之全智大师给我们（平安）10. 凭借我们信仰之根力。11. 因（佛）法国之缘由停留于其力。

#### （四）注释

1 (4) *čilayu*: 源自词根*čilä*-本义为“湿、润”。但词义与上下文不符合, 根据语境此处我们认为该词有可能为*čimlayu*“真如”之误写。

3 (3) *vyakrit*: 通过 Tocha/B *vyākarit* 借自梵语 *vyākṛti*“授记<sup>①</sup>”。

10 (3-4) *yiltizimīznīŋ küčindä*: 译作“凭借我们之根力”。回鹘文 *yiltiz küči* 为“根力”。根力为佛教术语, 意为“五根与五力。法华经譬喻品曰:‘无漏根力觉道。’”<sup>②</sup>

7 (3-4) *altı ödtä*: 意为“六时”。

### 回鹘文书三<sup>③</sup>

#### （一）文书简介

发现于57窟前室地窖中,<sup>④</sup>呈不规则长方形,淡黄色木质,长6.2厘米,宽3.8厘米,回鹘文墨笔草体双面书写,每一面有回鹘文2行,木牍上部有穿孔,有坠绳,木牍两侧有凹槽。(见图3-4)

#### （二）原文转写正面<sup>⑤</sup>

1 *šakimuni burqan*

2 *-qa yükünürm (ä) n*

#### 背面

1 *tuymiš toyril*

2 *tarqan yüknürm (ä) n*

#### （二）汉译

##### 正面

1-2. 我膜拜释迦牟尼佛

##### 背面

1 -2 我脱合迷失托合利达官膜拜

① Wilkens, Jens, *Handwörterbuch des Altuigurischen*, Göttingen, 2021, p. 848.

② 丁福保《佛学大辞典》,北京:中国书店,2011年,第1806页。

③ 《新疆鄯善吐峪沟西区中部高台窟院发掘报告》图版贰拾贰中将木牍正面和背面颠倒。详见:李裕群、夏立栋、王龙、张海龙《新疆鄯善吐峪沟西区中部高台窟院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20年第3期,图版贰拾贰中第4和第5。

④ 李裕群、夏立栋、王龙、张海龙《新疆鄯善吐峪沟西区中部高台窟院发掘报告》,第452页。

⑤ 根据回鹘文的书写和相关知识,施主的姓名一般应书写在木牌的背面,付马等书写正好与本文相反,详见:Fu Ma and Xia Lidong, *Philological Study of Several Old Uighur Tantric Manuscripts Recently Unearthed from Tuyuq, Xinjiang*, p. 28.

## (三) 注释

1 (1) *tuγmīš*: 词根为动词 *tuγ-* “出生”, *tuγmīš* 一词作名词还有“血族、血缘者<sup>①</sup>”之意。此处作人名, 同样的用法在回鹘文契约买卖文书 Sa18-21, Sa26-2 和 Sa26-7 中出现过<sup>②</sup>。从图中书写中可以清楚的看到应为 *tuγmīš*, 付马等将其读作 *turmīš*<sup>③</sup> 应予以修正。

2 (1) *tarqan*: 对应中文的“达官(统治者的官衔)<sup>④</sup>”。高昌回鹘王国的最高统治者称“亦都护 *idiqut*”, 其下有九宰相, *ulči*, *tarqan* 等高级官吏<sup>⑤</sup>。由此可见, 施主身份之显赫。

## 回鹘文书四释读

## (一) 文书简介

文书发现于 57 窟前室地窖中, 两头尖, 中间呈不规则长方形, 木质, 长 6.2 厘米, 宽 3.8 厘米, 木质呈淡黄色, 回鹘文墨笔草体单面书写, 共 1 行文字, 字迹模糊, 保存较差。(见图 5-6)

## (二) 原文转写

1 *män udmīš šabi-tu* (.)

## (三) 汉译

1. 我吾得迷失 (Udmīš) 沙弥都统 (Tutuṅ)。

(四) 注释<sup>⑥</sup>

1 (2) *udmīš*. 此处用作专有名词表示人名。需要指出的是, 虽然在一些晚期回鹘文献中, 字母 *d* 和 *t* 混用较常见, 但此处题记中的 *udmīš* 不等于 *utmīš*。原因有二: 一是从正字法中来看此处题记确实写作 *udmīš* 非 *utmīš*; 二是 *ut-* 和 *ud-* 是两个不同的词, *utmīš* 词根为 *ut-* “胜利”, *udmīš* 词根为 *ud-* “跟随”。此外, 虽然在一些回鹘文契约文书中人名 *Utmīš* 和 *Udmīš* 被认为是同一名字, 但二者含义和词源不同, 应予以区别。

1 (3) *šabi-tu*, 译作“沙弥都统”, *šabi* 源自汉语“沙弥”, 此处用作人名, 对应

① Yamada Nobuo, *Uigurubun keiyaku monjo shūsei* ウイグル文契約文書集成 [German title: Sammlung uigurischer Kontrakte] . 1-3. Edited by Juten Oda, Peter Zieme, Hiroshi Umemura and Takao Moriyasu. Osaka: Osak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294.

② Yamada Nobuo, *Uigurubun keiyaku monjo shūsei* ウイグル文契約文書集成 [German title: Sammlung uigurischer Kontrakte] . 1-3. Edited by Juten Oda, Peter Zieme, Hiroshi Umemura and Takao Moriyasu. Osaka: Osak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294.

③ Fu Ma and Xia Lidong, *Philological Study of Several Old Uighur Tantric Manuscripts Recently Unearthed from Tuyuq, Xinjiang*, *Acta Orientalia Hung*, 2022, 75 (1), p. 28.

④ Wilkens, Jens. *Handwörterbuch des Altuigurischen*, Göttingen, 2021, p. 677.

⑤ 耿世民《内亚文史论集》,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5年, 第340页。

⑥ Yamada Nobuo, *Uigurubun keiyaku monjo shūsei* ウイグル文契約文書集成 [German title: Sammlung uigurischer Kontrakte] . 1-3. Edited by Juten Oda, Peter Zieme, Hiroshi Umemura and Takao Moriyasu, Osaka: Osak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296.

梵语的śrāmaṇera。šabi 作为人名在 SUK 中多次出现。<sup>①</sup> 后缀 tu 常常缀加在人名之后与汉文的“奴”对应，但有时也作为都统 (tutuŋ) 的略称。<sup>②</sup>

#### 回鹘文文书五释读

##### (一) 文书简介

文书发现于 51 窟前室前部，<sup>③</sup> 呈不规则长方形，似桃形一端两侧有凹槽，且上有圆孔，木质淡黄色，长 6.3 厘米，宽 1.9 厘米，<sup>④</sup> 回鹘文墨笔草体双面书写，共 1 行文字，字迹模糊，保存一般。(见图 6-7)

##### (二) 原文转写

正面

1 mǎniŋ beš ažuŋ<sup>⑤</sup> (?)

背面

1 m (ä) n tekuy šila

##### (三) 汉译

正面

1. 我之五界?

背面

1. 我定慧尸罗

##### (四) 注释

1 (2) tekuy: 汉语借词“定慧”。Tekuy šäli 在吐峪沟 10 号<sup>⑥</sup>窟题记中也出现过，题记还写到“定慧阁梨猪年在此 (吐峪沟) 膜拜<sup>⑦</sup>”之语。虽然如此，我们还没有直接的证据可以证明这里的定慧大师就是当年 (猪年) 来吐峪沟石窟敬拜的定慧。如果两人为同一人，则可以证明定慧本人不仅来过吐峪沟敬拜，而且还留下了此件木牌。

#### 回鹘文书六释读

##### (一) 文书简介

文书发现于 40 窟前室，呈不规则长方形，木质、淡黄色，长 8.2 厘米，宽 1.1 厘

① Yamada Nobuo, *Uigurubun keiyaku monjo shūsei* ウイグル文契約文書集成 [German title: Sammlung uigurischer Kontrakte] . 1-3. Edited by Juten Oda, Peter Zieme, Hiroshi Umemura and Takao Moriyasu, Osaka: Osak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284.

② Yakup, Abdurishid and Li Xiao. A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old Uighur pilgrim inscriptions recently discovered in the cave NK 10 in the Tuyuq grottoes of Turfan, *AOH*, Volume 72 (4), 2019, p. 404.

③ 李裕群、夏立栋、王龙、张海龙《新疆鄯善吐峪沟西区中部高台窟院发掘报告》，第 452 页。

④ 李裕群、夏立栋、王龙、张海龙《新疆鄯善吐峪沟西区中部高台窟院发掘报告》，第 452 页。

⑤ 付马等读作 yüz。见：Fu Ma and Xia Lidong, *Philological Study of Several Old Uighur Tantric Manuscripts Recently Unearthed from Tuyuq, Xinjiang*, p. 29.

⑥ 根据《考古学报》的最新编号，现在是吐峪沟的 26 号窟。详见李裕群、夏立栋、王龙、张海龙《新疆鄯善吐峪沟西区中部高台窟院发掘报告》，第 429-459 页。

⑦ 李刚、张海龙《吐鲁番吐峪沟 10 号窟新发现之回鹘文题记考释》，《西域研究》2021 年第 1 期，第 155 页。

米，回鹘文回鹘语草体墨笔双面书写，共1行文字，背面字体漫漶不清，不可辨识，保存较差。（见图8-9）

（二）原文转写

1 burxaŋqa

（二）汉译

1. （向）佛

回鹘文书七释读

（一）题记简介

回鹘文题记类文书七出土于18窟主室前部右侧壁下，<sup>①</sup>题记左侧有少许壁画残存。回鹘文题记墨笔书写于红底之上，题记左侧可以清楚看到一条红色的榜题框线，题记为回鹘文墨笔行体书写，共5行文字，壁画残高21厘米、宽13厘米、厚3厘米，<sup>②</sup>保存较好，大部分文字残存且清晰可辨。（见图10）

（二）原文转写

1 [ ] L' RYM lun (?)

2 t (ä) gi tükäl-lig bilgä šazın toyın-lar [ ]

3 tatıy

4 ayγuči š (a) bi t (ä) ŋri tuɖunug T [ ]

5 KWT [ ] (.) [ ]

（三）汉译

1… 龙(?) 2. 谨…全智的沙津诸僧…… 3. 美味 4. 讲经师沙弥腾格里土都……5  
……

（四）注释

2 (4) šazın <skt. sāsana “教义、戒律”，有时又写作 šazan 或 šāsan，汉音译为“沙津”。

4 (4) tuɖunug <tudun “持<sup>③</sup>，内行、专家<sup>④</sup>” + -ug (宾格附加成分)，汉音译为“土都”。

### 三、相关问题探究

（一）回鹘文书一的名称与年代

① 李裕群、夏立栋、王龙、张海龙《新疆鄯善吐峪沟西区中部高台窟院发掘报告》，第449页。

② 李裕群、夏立栋、王龙、张海龙《新疆鄯善吐峪沟西区中部高台窟院发掘报告》，第449页。

③ 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回鹘文诗体注疏和新发现敦煌本韵文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44页。

④ Şinasi Tekin, *Maitrismit nom bitig Die uighurische Übersetzung eines Werkes der buddhischen Vaibhāsika-Schule (Teil 2)*, Akademie-Verlag · Berlin [Berliner Turfantexte IX], p. 122.

经我们研究后发现，回鹘文书一中的 12 行内容与德国柏林藏编号为 U4740 回鹘文《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回鹘文 *Täŋri täŋrisi burxan yrliqamiš yetikän üzä öz yaš uzun qılmaq atlıy sudur nom bitig*）》（简称《七星经》或《北斗七星经》回鹘文简称 *Yetikän Sudur*）文书的第 14-25 行<sup>①</sup>内容完全对应。因此回鹘文书一为《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

柏林藏的回鹘文《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编号为 T I）有四个版本，共有 148 行，回鹘文译本由别失八里人 Alin Tämur 完成，施主为女信徒 Siliry Tegin。<sup>②</sup> 德藏《七星经》为回鹘文楷体书写，正字法上，字母 q、š 上有区别的两点，文书上下游边框线，保存较好。关于该经的翻译时间莫衷一是，李盖提（Ligeti Louis）和冯加班（von Gabain）先生认为是 1373 年，茨墨（Peter Zieme）先生认为是 1313 年。<sup>③</sup>

吐峪沟石窟新出土的《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仅有 12 行，回鹘文草体书写，保存一般，文书上下无边框线，不完整。在正字法上有蒙元时期回鹘文书鲜明的特点，个别词书写迥异，如斋月（十二月）一词，德藏本写作 č(a)xšap(a)t，吐峪沟本写作 çaxšabuđ；此外还在字母 d 与 t，s 与 z 的书写存在交替混写的现象，如，第二行 tört “四”写作 törd；第六行 otuz “三十”却写作 oduz；第九行的 toquzunč “九”却写作 toqusunč 等。综上所述，此件《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的抄写时间也属于蒙元时期。

本文所刊布的这件残叶属于 U4740 柏林藏吐鲁番文书中的一部分，U4740 这件文书共有 27 行，从两件文书比对来看，吐峪沟出土的这件《七星经》文书并没有抄完。U4740 的第 12-13 行写道：“yetikän-kä yula tamdurgu kün-lär-ig ayu berälim<sup>④</sup>（让我说出为七星经燃灯的日子吧）”，第 26 行写道：“yula tamturgu kün-lär tükädi<sup>⑤</sup>（燃灯的日子结束了）”由此我们知道，吐峪沟出土这件回鹘文书上提到的十二个具体时间就是“为北斗七星燃灯之日”，通过这些燃灯日从而达到延命长寿之目的。<sup>⑥</sup> 14 世纪时，必兰纳识里又据回鹘文将其译为蒙古语。<sup>⑦</sup> 因此，我们似乎可以窥见到，《七星经》不仅在蒙元时期的古代吐鲁番的回鹘人中流行过，还在蒙古部族中流行过。

## （二）回鹘文书二韵文探讨

关于此件文书，从文书的释读的内容来看属于佛经中的祈愿类。因为文书的第三行和第四行分别出现表示祈愿的动词形式，如，tanuqlalim “让我们见证/目睹”，asiry qılalim “让我使……受益”等明显的表示祈愿的形式。但从 11 行文字中可以看到，行

① Peter Zieme, (*Magische Texte des uigurischen Buddhismus Berliner Turfantexte XXIII*), Berlin, 2005, p. 146.

② 牛汝极《回鹘佛教文献：佛典总论及巴黎所藏敦煌回鹘文佛教文献》，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169 页。

③ 牛汝极《回鹘佛教文献：佛典总论及巴黎所藏敦煌回鹘文佛教文献》，第 169 页。

④ Peter Zieme, *Magische Texte des uigurischen Buddhismus (Berliner Turfantexte XXIII)*, p. 146.

⑤ Peter Zieme, *Magische Texte des uigurischen Buddhismus (Berliner Turfantexte XXIII)*, p. 146.

⑥ 杨富学《回鹘之佛教》，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166 页。

⑦ 杨富学《回鹘之佛教》，第 152 页。

与行间有明显的押韵现象，如，第1、2、4、8行押头韵 a，第2、4行同时又押脚韵 up<sup>①</sup>；第3、5行既押头韵 nom 又押脚韵 alim；第3、5、6、7、9行押头韵 u，第6、7、8行同时押脚韵 äsän；第9、10、11行均押脚韵 ä，虽然6-8行押脚韵且尾词（äsän）完全相同，但实际上与9-11行中元音 ä 属于同韵；第10行虽然与其他行没有押头韵但与上述第6、7、8、9、11行同押脚韵 ä，属于同韵，不仅如此，第6-8行内部也存在押头韵现象（tünlä、ödtä、enč等），这种内部押韵一直持续到回鹘语的较晚时期。<sup>②</sup>

除此之外，每行韵文的音节也有一定的规律。根据皮特·茨墨（Peter Zieme）先生的研究，多数押头韵的回鹘文诗歌由十四个音节组成，他们显示  $4+4//3+3$  的公式，十三和十五音节组成的诗歌也比较普遍，由十一和十八音节组成的诗歌却很少。<sup>③</sup> 显然，第3、5行押头韵的音节都在十四个以上，最少的音节也达到了10个，并且还同时押头韵和押脚韵（第3、5行）。

- 1 yaruq yalqırıy [ ] WSWP čılayu [ ] VD-ZWN (10个音节)
- 2 baxşı birlä bolyan-lar-niñ udušmaq-ınga tusuşup (16个音节)
- 3 nom äšidip arqant bolup tuyunmaq-ıy tanuqlalim (16个音节)
- 4 kalp alqınγınča baxşı birlä burxan-qa utlı öđünüp (17个音节)
- 5 nom-uγ WL [ ] oγuγš-ındaqı-larqa asıy qılalim (14个音节)
- 6 künđüz enčäsän tünlä enčäsän (10个音节)
- 7 künđüz tünlä altı ödtä enčäsän (11个音节)
- 8 alčulayu oq alqu ödtä enčäsän (12个音节)
- 9 utlı täg tükäl-lig baxşı (….) z-un biligä (12个音节)
- 10 biz-niñ kertgüč-lüg yiltüz-İMİZ küčindä (12个音节)
- 11 nom oγuš-niñ tılqay- [ın] tın turtım (?) -a küčindä (14个音节)

从文书的内容来看，这显然不属于诗歌范畴，但它却具备了诗歌押韵特点。无可争议的是，古代维吾尔语（回鹘语）押头韵的诗歌大多是13世纪至14世纪的产物<sup>④</sup>。此外，从回鹘文的正字法上看，存在字母 d、t 交替现象（第6、7行 küntüz~künđüz，第11行 tıltaγ~tılqay），这又具备了晚期回鹘文献的书写特点。因此，结合文书正字法和文书普遍存在押头韵等因素，该件文书可初步判定为蒙元时期。

### （三）回鹘文书三、四、五、六的功用和施主身份管窥

这四件回鹘文木牍文书虽然信息量有限，但文字内容为我们推测木牍使用的功能提

① 在回鹘语言中 o、ö、u、ü 均属同韵。关于此，见杨富学、叶凯歌《敦煌回鹘语头韵诗及其格律特征》，《敦煌研究》2021年第2期，第33、37页；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古代维吾尔语赞美诗和描写性韵文的语文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5页。

② 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古代维吾尔语赞美诗和描写性韵文的语文学研究》，第6页。

③ Peter Zieme, *Die Stabreimtexte der Uiguren von Turfan und Dunhuang, Studien zur alttürkischen Dichtung*, Budapest: Akadémiai kiadó, 1991a. p. 377.

④ 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古代维吾尔语赞美诗和描写性韵文的语文学研究》，第7页。

供了旁证。首先，这四件文书的文字均为回鹘文草体墨笔书写，书写格式基本相同。其次，除文书四，其余三件木牍顶部中间均有穿孔，两侧有凹槽，且文书三中穿绳尚存。经测量，穿孔绳长度约 25 厘米，经比较，我们发现文书三、五、六均有凹槽和穿孔痕迹，从功能上看应属同一类。四件文书中，只有文书四的形状差别较大，两头尖尖，仅一面残存文字，无穿孔、无凹槽，但从书写的回鹘文“udmiš šabi-tu（吾得迷失沙弥）”来看，沙弥是男子出家受十戒者之通称，这显然是与佛教密切相关的，剩余的三件木牍文书，从木牍上残留的人名 *tuγmiš toγril tarqan*（文书三，托和迷失托合利达官），*udmiš šabi-tu*（文书四，吾得迷失沙弥都统），*tekuy šila*（文书五，定慧尸罗）以及敬词 *yüknürm (ä) n*“我敬拜”等信息可以肯定，四件文书均与佛教有关，且文书三和五的主人的身份绝非一般普通百姓，应为达官贵人。文书六，因只残留了一半，背面施主的姓名已漫漶不清，仅存 *burxan-qa*“（向）佛”一词，内容也与佛教紧密关联。

#### 四、结语

自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大量的回鹘文题记、尤其是纸质回鹘文文书被各国探险家大批掠走，之后又散布于世界各国的图书馆或学术机构甚至是个人收藏之中。其中也不乏刻写回鹘文的木牍文书，除了本文研究的各类回鹘文文献之外，还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回鹘文木牍文书，<sup>①</sup> 主要有 1983 年日本学者梅村坦（Umemura Hiroshi）先生刊布的日本探险家大谷光瑞（Otani Kozui）探险队带回的两件回鹘文本简，<sup>②</sup> 经研究此木简的内容与佛教有关；1996 年伊斯拉菲尔·玉素甫先生刊布的《回鹘文中心木》，并认为此木牍与修建佛塔奠基仪式所用的木樁子有关；<sup>③</sup> 2018 年张铁山教授刊布的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的刻写在木牍四面上的回鹘文，并判定第一面出自于《大乘无量寿经》相关内容；<sup>④</sup> 同年，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先生又对胜金口发现的双面回鹘文本牍进行了释读研究并甄别出 A 面所写内容源自汉文佛经《思益梵天所问经》之相关内容，B 面虽未找到出处，但与此经有一定关系。<sup>⑤</sup>

可以看出，上述各类木牍回鹘文文献都与本文研究的木牍文献一样都与佛教有密切的关系。回鹘文《七星经》的再次发现以及木牍文书中的信息都充分说明佛教在丝绸之路重镇的吐鲁番持续的时间最长。此外，从文书的断代上也可以知晓，即使处于蒙古

① 除了探险家带走刊布的一些木牍回鹘文书外，吐鲁番还出土了 9 件相关文书。详见 [日] 梅村坦《中华人民共和国藏回鹘文写本》，载杨富学译《回鹘学译文集》，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2 年，第 43 页。

② [日] 梅村坦《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回鹘文本简》，载杨富学译《回鹘学译文集》，第 155 页。

③ 伊斯拉菲尔·玉素甫《回鹘文中心木》，《内陆亚语言研究》1996 年第 11 期，第 66 页。

④ 张铁山、彭金章《敦煌莫高窟北区 B77 窟出土木骨上的回鹘文题记研究》，《敦煌学辑刊》2018 年第 2 期，第 38 页。

⑤ Abdurishid Yakup, Li Xiao, An Old Uyghur text written on a wooden plate recently discovered in the Tuyuq Grottoes in Turfan,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p. 305.

统治的吐鲁番，当时的佛教香火依旧盛行，回鹘人翻译佛经，传抄佛经风靡一时，而回鹘文《七星经》在蒙元时期吐鲁番的诵读、抄写足以窥见当时回鹘人对于北斗七星的推崇，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回鹘人的宇宙观。

附记：本文在研究中，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Aydar Mirkamal）、松井太（Matsui Dai）两位先生曾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



图1 回鹘文《七星经》  
(吐鲁番学研究院供图)



图2



图3



图4

(图2 回鹘文祈愿文书，吐鲁番学研究院供图；图3 回鹘文木牍文书正面，图4 回鹘文木牍文书背面，图3和图4经吐鲁番学研究院允许，由李刚拍摄)



图 5



图 6



图 7



图 8



图 9

(图 5 回鹘文木牍文书单面；图 6 回鹘文木牍文书正面；图 7 回鹘文木牍文书背面；图 8 回鹘文木牍文书正面；图 9 回鹘文木牍文书背面，图 5 至图 9 经吐鲁番学研究院允许，由李刚拍摄)



图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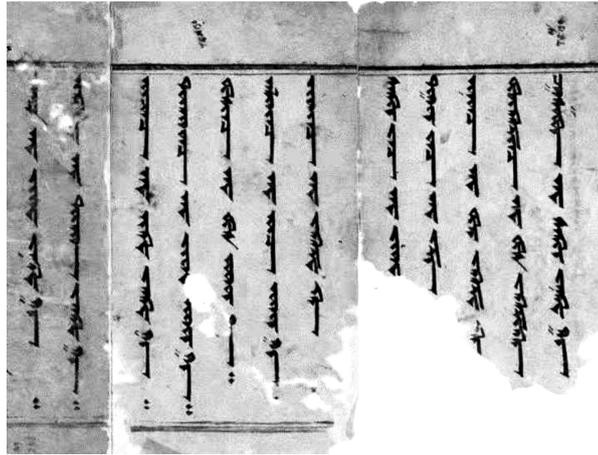


图 11

(图 10 回鹘文题记，吐鲁番学研究院供图；图 11 德藏回鹘文《七星经》，采自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吐鲁番研究院所藏《七星经》，编号为 U4740 文书)